

● 历史学

德国对待 1931—1933 年远东危机态度分析

王 扬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王 扬(1956-),男,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历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德国史研究。

[摘 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和《凡尔赛和约》的束缚,对日本采取了承认其在远东的霸权地位,认同其在中国的特殊利益的政策,以便争取得到日本更多的同情和支持。受这种意图影响,在“9.18事变”爆发后,德国在国联采取了表面上“中立”,实际上袒护和纵容日本的政策,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关键词] 魏玛德国;远东危机;外交政策

[中图分类号] K 516.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2-0239-04

1931年“9.18事变”发生后,西方列强出于各自私利,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制止不力,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本文拟对国联常任理事国之一德国的态度进行分析。

中日冲突之始,德国就决定采取不与日本作对的政策。1931年9月24日,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冯·比洛指示驻日内瓦代表伯恩斯托夫:“不得支持反日阵营”,也不参加列强采取的对日本不利的一致行动^[1](第440页)。10月8日,日本轰炸锦州,侵华战争扩大。10日,比洛在给驻日内瓦临时公使冯·穆蒂斯的指示中认为,鉴于中日冲突局势扩大化,英美等国可能会要求国联采取积极干涉行动。他再次告诫德国代表团,不要轻易加入反日阵营,“从所有政治原因出发,我们必须顾惜到日本,……上述考虑迫切地要求我们,在任何有关反日阵营问题上保持克制”^[1](第514页)。

德国政府对于国内舆论同情中国、谴责日本侵略行动的倾向感到不安,一再进行干预。22日,外交部官员冯·雪恩在一封信中写道:“德国舆论倾向于支持中国,外交部正努力对新闻界施加影响,以使其回到中立立场”^[1](第439页)。比洛在24日的指示中也提到:“我们在继续对新闻界施压,促使其在中日冲突中保持完全中立的立场;也禁止新闻报道借批评日本对国联的态度来反对日本”^[1](第440页)。

在国联中,德国扮演了消极、沉默、被动的角色,而把制止日本侵略的责任推给英、法、美等国,希望他们根据1922

年华盛顿公约处理中日冲突。雪恩在9月22日的信中写道:“在目前的冲突中,我们要尽可能地置身于幕后;我们希望通过国联内部的合作来解决争端,除此之外,我们不会参与其它寻求解决争端的行动,因为那是华盛顿公约签署国的任务,而德国不是签署国”。24日,比洛在给出席日内瓦国联会议德国代表的指示中,要求他们“采取极其谨慎的旁观态度”^[1](第440页)。10月10日,比洛又指示德国代表:在国联行政院讨论有关决议时,“保持最大克制,尽可能让其它列强去处理”。他也提出,尽量把解决冲突的责任推卸给华盛顿公约签署国,同时要注意避免引起外界的非议。他写道:“1922年2月6日的华盛顿九国公约,毕竟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即根据公约,签字国(美、比、英、法、意、日、荷、葡、中)有责任保障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不受损害;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充分和自由的意见交换。德国虽然也曾准备加入该公约,但终因未获批准而被排斥在外。现在,让该公约的签字国来处理满洲事变,正符合我们的意愿和利益。然而,我们也要注意表达这种意愿的分寸,以免造成误解,让人觉得我们有意逃避责任和拒绝发挥作用”^[1](第514页)。

鉴于中日冲突的发展态势和列强态度的变化,11月5日,正在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的穆蒂斯向德国外交部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国联中采取一些积极行动。他写道:“如果有一天,所有关于该事件的白皮书都被公布,我们不应留给世人这样的印象,即德国对待东亚事变的态度像对待国联一样漠不关心”^[2](第107页)。但是,他的建议遭到了外交部的

拒绝。外交部官员迈耶尔在 11 月 10 日认为:穆蒂斯所提“从维护国联的权威出发,对中日双方采取积极行动”之建议,“既不符合目的,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同样,穆蒂斯的另一个建议,即要求日本把在中国境内的军队改变成具有民事职能的警察,也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样的建议一方面绝无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直接插手中日冲突,而这对我们来说既无理由,也会导致出现我们所不愿看到的局面”。为此,迈耶尔指示说:“我们必须严守迄今为止始终坚持的立场,即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主动行动”^[2](第 107—108 页)。

在中国遭受日本武力侵略的时刻,德国这种消极、被动、冷漠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是非不分、默许、纵容侵略的政策。更需要指出的是,德国在中日冲突中,并没有公正、平等地对待中国的呼吁和请求。

二

“9·18 事变”发生后,中国即呼吁德国主持公道,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但德国并没有理睬。9 月 22 日,德国代表在国联行政院会议的发言中,对中日冲突未作出任何明确表态^[3](第 9 页)。10 月 7 日,中国驻德公使代办向德国外交部递交一份照会,指责日本在华一系列侵略行动,希望作为凯洛格协定签字国和国联成员的德国政府,注意事态的严重性,认真看待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对 9 月 22 日国联决议的蔑视^[1](第 509 页)。比洛在次日作答时,首先借口德国政府内阁改组和国会的召开,致使其外交部长将不能参加国联定于 10 月 14 日召开的会议;接着又以德国能力有限为由,拒绝参加对日制裁行动。他表示:“我们坚持:弱国不应受到压制,国联会议的权威应得到尊重,和平保障应得到实施。但是,我们的行动只能限于外交活动,因为同其它国家不一样,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员到各处进行实地调查”。对于诉诸凯洛格协定问题,比洛表示赞同,“因为这对于美国参与今后所有必要行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他又警告中国,“不应得理不让人,使日本过于尴尬”。他并且认为,中国引用国联章程第 15 条,要求列强干涉日本是不适当的^[1](第 510, 513 页)。10 月 10 日,比洛在给德国驻北平公使的电报中称,经向凯洛格协定其它签字国询问方知,“中国政府没有向其它签字国发出请求。外交部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单单向德国提出请求?中国的行为促使我们格外谨慎”^[1](第 513 页)。

与对华态度相反,德国对于日本则一再强调其坚持友好政策的意图,甚至在国联会议内外,迎合、支持日本的要求。

日本从一开始就反对国联插手并组织调查团调查中日冲突事件,德国最初也表示不参加国联组织的调查团。9 月 24 日,比洛在给赴日内瓦德国代表团的指示中说:国联“如果要成立一个调查团的话,请拒绝派德国代表参加”^[1](第 440 页)。而且,根据日本的意图,德国希望限制调查团的规模,削弱调查团的权力^[2](第 189 页)。当得知调查团除了由英、美、法三国代表组成外,意大利也可能参加时,德国即改变态度,也准备派代表参加。12 月 1 日,比洛通过德国驻巴黎使馆致电穆蒂斯说:“据目前消息,调查团是否由三人组成尚未确定。虽然我们一再努力,尽可能控制调查团的规模,但

如果其成员除了英法美外,还有意大利或任何其它国家代表参加的话,我们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因此,如果调查团成员超过 3 人,德国就以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要求派代表参加。在这种情况下,请秘密转告出席会议的日本代表吉泽,我们准备派前驻日大使佐尔夫代表德国参加调查团”。12 月 5 日,外交部致电穆蒂斯,推出 3 人作为调查团成员的候选人,即佐尔夫、号称德国“国防军之父”的汉斯·冯·塞克特将军以及德国前东非殖民地总督施奈^[2](第 207 页)。

德国参加国联调查团的决定符合日本意愿,因为日本反对调查团仅由那些在华经济利益较大国代表组成。同时,日本更希望德方代表是亲日派佐尔夫,这样可以抵制德国舆论中的亲华倾向。但是,中国看重的是塞克特。最终,国联总秘书处规定:凡担任过驻华或驻日外交官员者,不得作为调查团成员。结果,施奈代表德国成为调查团成员,他被认为能在其中扮演中立、消极和保守的角色^[3](第 12—13 页)。

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但国联总想把美国拉进来,一起参与解决中日冲突。这是想让美国分担责任,同时借助其力量,改变国联的虚弱状态。日本则强烈反对美国的参与。10 月 13 日,国联理事会轮值主席法国外长白里安提议,邀请美国派一位观察家出席国联理事会会议,参与商讨更有效的解决中日冲突的办法。日本对此坚决反对,认为这涉及国联体制的原则,并提出动议,即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决定是否邀请美国参加。德国是唯一支持日本这一动议的国家。但是,在国联理事会以 12:2 的投票结果,否决了日本的动议以后,德国不得不在 10 月 15 日的会议上,投票赞成邀请美国的提案。10 月 19 日,德国外交部的埃里希·米切尔逊,在与中国代表的会晤中解释说,德国支持日本动议的行动与当前的危机无关,不会影响德国在危机中的中立态度。但是,中国代表显然不相信这种辩解^[3](第 11—12 页)。

随着中日冲突日益扩大,加之日本新闻界不断报道魏采尔等德国军事顾问参与上海战事的消息,德外交部深感不安。1932 年 1 月 29 日,德外交部电令驻华公使陶德曼,要求魏采尔及其他军事顾问不要参加任何军事活动。2 月 21 日,陶德曼电告外交部,称魏采尔去上海看望女儿。德国外交部对此消息“大吃一惊”。他们认为,尽管魏采尔行动谨慎,而且是为私事,但仍存在较大危险。“生性多疑的日本人,总把他的私人旅行与上海战事联系在一起,驻北平公使馆和驻东京大使馆曾一再辟谣,但关于德国支持中国军队的谣言总是不断”。因此,外交部指示陶德曼,要求魏采尔小心谨慎,尽快返回南京^[2](第 591—592 页)。

德国的亲日态度,在穆蒂斯 1931 年 11 月 27 日给德国驻日大使弗累彻的信中,表达得十分明确:“我们在中、日冲突中的立场可以简单概括为:尽力采取您所提倡的‘仁慈的中立’,并略带亲日倾向。您已知道,代表团和外交部因此遭到严厉的批评,特别是当我们独家支持日本的那项提案时”^[2](第 189 页)。由于德国在国联的态度及表现受到国内外舆论批评,外交部官员屈普克 1932 年 2 月 18 日致电代表团,专门就应答舆论批评确定了原则^[2](第 582—583 页)。

日本对于德国的态度十分满意。1932 年 2 月 22 日,德

国驻苏大使冯·狄克逊会晤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宏毅。广田对德国在中、日冲突中的态度和做法表示感谢。他表示,现在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主张完全取消德国的赔偿。虽然日本所要求的赔偿额不大,但是,日本的原则立场对德国意义重大^[2](第 595 页)。虽然,德国外交部对广田希望改善两国关系的暗示未作积极反应,但是,比洛在 2 月 27 日给狄克逊的回电中表示,对于日本的满意和赏识感到高兴^[3](第 13 页)。

综上所述,在日本侵略中国之际,德国不仅未响应中国的呼吁和请求,公开站出来主持公道,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相反,出于一己私利,一再示好于日本,并时时遵从日本意愿。因此,德国袒护日本是不争的事实。

三

德国为何在国联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仁慈中立”政策?

诚然,战后德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受到削弱,在国际事务中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在国联中的行动亦时常受到其它大国态度的影响;英、法、美对待中、日冲突的暧昧态度及其变化,对于德国政策中亲日倾向的形成,具有不容否定的影响;法国在中日冲突中明显的亲日倾向,也使德国的外交家们担心一个法、日联盟的出现,会使德国在赔款、东部领土和边界确定以及裁军问题上,面临更大的压力^[4](第 148 页)。但是,更主要的是,德国对中、日两国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同。从这期德国外交文件记载中可以看出,在德国人眼里,战后中国是一个政局不稳、内忧外患的国家,在国际政治中所能起的作用有限。战后德国经济界对中国抱有浓厚的兴趣,出现许多开拓中国市场的计划、方案,但德国从未认真地考虑过在政治上与中国结盟的问题。在德国的远东政策中,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能够为其提供生产原料和商品市场的经济伙伴,而不会成为帮助其走出危机的政治盟友。日本则不同。德国看到了日本在战争中和战后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军事实力,以及日本同英美等列强的矛盾,认为日本在战后赔款、裁军、东部领土划分及德国重返国际社会等重大问题上,都有可能理解、帮助、支持自己。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德国不仅对日本采取重修旧好政策,而且在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对日本多有妥协和让步。

魏玛政府成立后不久,德国就同日本秘密接触,以求重建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关系。1918 年 11 月 26 日,德国外交部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战争期间,日本加强了其在远东的地位,同时也引起了其盟国英国和美国的不信任,“我们曾利用各种机会,多次提醒日本注意,我们两国之间的利益对抗不应再继续下去了”^[5](第 215 页)。德国军方更是通过其驻斯德哥尔摩使馆武官,与日本军方进行长期接触,寻求两国军事合作的途径。德国外交部在 1919 年 1 月 28 日发给德驻斯德哥尔摩公使鲁西斯·冯·施丢藤的公函中,通报了日本驻斯德哥尔摩使馆武官梅崎通过中间人转告其欲秘密访德的愿望^[6](第 215 页)。1919 年 3 月 25 日,德国军事参谋部冯·温特费尔特少将向外交部转交了军方北欧情报组的一份报告,其中汇报了德军与日本军方接触的情况,并提到梅崎曾表示:日本军界对德国的军事组织能力十分钦佩,希望

德国派军官帮助日本重组军队^[5](第 342—344 页)。

《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德、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总的说来比较顺利。1920 年,德国驻日大使佐尔夫赴日上任,标志着德、日两国外交关系正式恢复。在关于归还日在德的德国人财产问题上,德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使这个棘手的遗留问题得以解决,扫除了两国关系发展中的一大障碍;1924 年,德国开始与日本谈判两国通商条约问题;1925 年,德国拟在柏林建立“日本学院”,日本也有在本国建立“德国学院”的愿望;1926 年 7 月 23 日—8 月 19 日,德国巡洋舰“汉堡号”访日,这是自 1914 年以来,访问日本的第一艘德国战舰。佐尔夫认为,访问的整个过程令人满意,“可以称得上是两国重新接触道路上十分成功的一步”^[6](第 375—376 页)。1927 年 1 月 13 日,日本驻德武官渡边向德国国防部书面提议,两国互派武官。德外交部认为:“德日两军重建传统关系,将加强日本军界的亲德倾向,对未来也将产生良好影响”^[7](第 158 页)。

此外,鉴于战后日本的强国地位已得到巩固,德国明确承认了日本在东亚的霸权地位以及在中国的特殊利益。1919 年 10 月 20 日,德国外交部官员克尼平在同日本大使会谈时说:德国希望日本明白,“我们为恢复对中国贸易的努力,在任何方面都将与日本的‘门罗主义’保持一致;我们愿意考虑日本在东亚、首先是在中国的地位;因此,我们不会背着日本重建与中国的关系”^[8](第 362 页)。

1920 年 7 月 3 日一份未署名的备忘录,反映了德国外交部对于远东局势的判断,以及德国远东政策的基本构想。关于远东局势:目前中国内政混乱,外交艰难,“由于日本的侵略、其它大国的漠不关心等外部原因,使得中国局势的恢复更加困难了。从 1915 年起,日本就始终毫不偏倚地稳步行进在通往既定目标的道路上,这个既定目标,是其自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就已确定的,即统治亚洲。日本目前关心的是:满足国内对来自中国的煤和铁的需求,并保障这一运输线的通畅;维护日本在满洲和山东的特殊地位”。基于这种认识,德国外交部对中日两国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备忘录中写道:德国在远东外交中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与日本和中国重建相等程度的友好关系(危险在于两头落空),尝试对中日之间业已存在的对立进行斡旋。但原则上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统治地位(当然是由于 1917 年 11 月蓝辛—石井协定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德国在执行远东政策过程中,必须协调好与日本的关系。备忘录指出:“没有日本的赞同,我们的经济活动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不会有任何成功的前景。只有利用日本的友好态度,才有可能冲破其它协约国为抵制我们在远东重现而设置的障碍”^[9](第 326—329 页)。

因此,德国坚持维护日本在我国山东地区所获得的权益,拒绝与中国谈论任何有关日本在山东的权利问题。当中国拒绝签署《凡尔赛和约》后,德国外交部官员罗姆贝格在 1919 年 7 月 17 日写道:山东问题使德国无法同中国商讨其他问题。德国签署了《凡尔赛和约》,必须尊重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与中国对话就意味着我们想要改变和约的条款……从政治上看,这对于我们同日本的关系可能是灾难性的。由于排除了青岛问题,我们与日本之间的

关系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发展局面。如果我们现在同中国商讨山东问题,我们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将会再次受到严重动摇”^[8](第 173 页)。7 月 19 日,德、中两国商贸代表举行会谈。在罗姆贝格会前为德方代表起草的发言稿中这样写道:如果满足了中国的愿望,“将使我们失去日本的友谊,而没有这种友谊,我们就不能指望在中国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8](第 174 页)。1919 年 11 月 1 日,德国外交部官员梯尔在同日本大使会谈时保证说:“我们一经签署和约,就将忠实地履行其所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不会同中国进行旨在推翻或改变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解决办法的谈判”^[8](第 362 页)。这表明德国不惜以牺牲中国利益博取日本的欢心。

当然,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还未完全脱离协约国集团,在对待德国问题上,还常常迎合英、法等大国的政策,因此,德国同日本的关系也常有波折。此外,由于德国在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德国远东政策中的亲日倾向,不能完全阻止德国在对华政策中,采取一定程度的“友好”、“中立”态度。但是,由于德国在摆脱《凡尔赛和约》束缚的抗争中,需要日本的理解、帮助、甚至支持,这就必然影响到德国在中、日冲突问题上,采取有所偏袒的态度。

1931 年 9 月 22 日,雪恩在致函德国参加国联会议的代表时就明确表示,对日本政治作用的重视,决定了德国在中、日冲突中决不会采取与日本为敌的政策。他写道:“对我们来说,不存在与日本作对的动机。近年来,在一系列与我们有关的问题上(上西里西亚、赔款、默麦尔等),日本都采取了对我们十分有利的立场,在这些和其它政治问题上,我们仍需要日本的友善态度和继续支持。因此,让别人把我们推进反日阵营,由此重犯 1895 年三国干涉还辽的错误,不符合德国的利益”。1932 年 1 月 7 日美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不承认主义原则后,德国驻日大使弗累彻于 1 月 8 日致函外交部,声称德国应该接受远东政治变化的现实,并采取相应行动,因为德国的政治利益并不会受到损害。况且,如果德国遇到困难,也可以得到日本的帮助。中国在政治上却不能给德国任何东

西。他甚至要求外交部公开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以便约束德国报刊对日本的攻击。“因为无论是日本人民,还是日本政府,都不会忘却这种攻击”^[1](第 439—440 页)。

综上所述,“9. 18 事变”后,德国不仅态度消极,不能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和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反而一再无视中国的呼吁和请求,时时迎合日本的意愿,实质上纵容和袒护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德国这种亲日、袒日态度,反映了企图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在欧洲问题上同情、甚至支持德国的目的,这也正是魏玛德国远东政策的一个基本特征。

[参 考 文 献]

- [1]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1918—1945, Teil B, Band 18[Z]. Goettingen, 1966.
- [2]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1918—1945, Teil B, Band 19[Z]. Goettingen, 1966.
- [3] Jon P. Fox, Germany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1931—1938 [M], Oxford, Clarendon Pr., 1982.
- [4] Christopher Thorne, The Limits of Foreign Policy: The West, the League and the Far Eastern Crisis of 1931—1933, [M] London, 1972.
- [5]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1918—1945, Teil A, Band 1[Z]. Bonn, 1955.
- [6]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1918—1945, Teil B, Band 3[Z]. Goettingen, 1966.
- [7]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1918—1945, Teil B, Band 4[Z]. Goettingen, 1966.
- [8]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1918—1945, Teil A, Band 2[Z]. Bonn, 1955.
- [9]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1918—1945, Teil A, Band 3[Z]. Bonn, 1955.

(责任编辑 张 琳)

German Attitude Towards Far-Eastern Crisis (1931—1933)

WANG Y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WANG Yang (1956-),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German history.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First World War, Weimar Germany strove to be lifted out of isolation and to cast off the of the Versailles Treaty. It admitted Japanese hegemony in Far-Eastern and her special interests in China, in order to win over her sympathy and support. For these reasons, after occur of Mukdan Incident, Germany remained superficial neutral in the League, but essentially was partial to Japan. This policy injured grievous the Chinese feelings.

Key words: Weimar Germany; Far-Eastern Crisis; foreign policy